

重榮詩品校釋

呂德申著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
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
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
曰鬱陶乎乎心楚謠曰名余曰正雨
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嵘《诗品》校释/吕德申著.2 版.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7

ISBN 7-301-01364-7

(文学论丛)

I . 钟… II . ①钟… ②吕… III . 诗品-校释 IV . 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979 号

书 名：钟 嵘《诗品》校 释

著作责任者：吕德申

责任 编辑：黎 戈

标 准 书 号：ISBN 7-301-01364-7/I·0229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2

电 子 信 箱：z 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62756343

印 刷 者：北京飞达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20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二版 200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15.00 元

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卷之十一

山堂居士譜草

知足齋主人

文章門

評詩類

正義記宋公車博士所引曰愚之動物物之感人拔鵠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彈謫萬有靈不待之以致靈此微言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即雲之頌歌而秦夏歌曰樂固乎予心楚謡曰名余曰正則其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東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体固是秦漢之製非袁周之倡也自王揚子賦馬之徒詞賦競興而吟詠聲聞從李都尉迄明齊行持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該我事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贊木天文降及建安文皆公少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

周易爲當世詩言之最盛者矣文未深感而作也嘗九品論人
七略載十七校以寔貧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詩後亦可知以
指其一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二十才体物之幽思文雅
日月寔矣天人昔在貴遊已爲首况八絃既金屬繁音響絕
王者聽有接殊者雖武以破漢觀而不羣名韻味於音中詠非
農歌賦遠致流別聲今錄庶周旋於間理均於詠矣耳
其体源出於匡風陳辭所傳十四首又溫以雅意悉而廣
驚心動魄可謂幾少字子全其外美者曰以陳四十五首雖
多哀怨頗爲艱晦得教子建安中曹子所舉客從遠方來備他
事華實亦為繁縝矣人代嘵吟而清音獨遠悲夫○萬古詞
後詩其源此於楚辭之多變然有之流陵名蒙子有殊之生倉
不謂言類身更使陵不遺卒苦旨之亦何自至此○

其源出於李陵固矣知章論曰清變之深文綴得所婦之
致侏儒一節可以知矣矣○

书影二
明正德元年退翁书院抄本《诗品》

詩品上
梁征遠記室叅軍鍾嵘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
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祐待之以致饗
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
曰鬱陶乎予心楚謡曰名余曰正則雖詩
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
著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
文體固非次漢之襲非衰周之倡也自王

諸公徇聲世稱侏儒善恬澹之詞
晉荀勗十載達
晉東陽太守蔡仲文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書謝
族仲文爲華綺之冠歎不竟矣
宋尚書令傅亮
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持進撰詩載
其聲首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
羊曜璠

宋齊事追詩
乃不稱其才亦爲舛矣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鑠
宋建平王宏
孝武詩雕文賦詠爲精客爲二津和葉
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
希遠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然與屬闇
長良無鄙似也

书影三 明抄本《陈学士吟窗杂录·诗品》

陳學士吟窗雜錄卷之二

梁征遠記室參軍鍾嵘撰

河間王氏藏書

詩品上
敘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情性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晖麗萬有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鄉雲之頃歌義蔓矣夏歌曰謌陶乎予心雖詩體未備略楚五言之溢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從李至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諫史質而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謌歌為文機鋒橫互槩為其羽翼翼普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座矣及江表孫綽許詢皆平與建安風力盡矣

許日朱道許姓氏有清工之可資表傳追食方但
之至乎追子顯示有一時之譽
參見周太守跋仲文
許日晉書李之斯傳無惜今其照中以前且奇其作文
烏乎南之望其行失其先
許日字子玄公嘗心而不安今次特追遺稿其故者
不復可尋

卷之三
朱紀生何長繪
許日子羊暖書
不見其人而知其才此二人之解語
朱慶雲完璧
許日朝余詩刀不稱其才亦烏鮮舉足
朱爾平王劉映
許日李武帝詩體文徵明過馬情深云刻布易見其妙
朱光耀謝金

卷之三
朱御之張質生
宋中書令史修之
宋太宗御令史晏景思
許日君子生者有事于其門之非徒以人外之
是念有可取焉
朱皇是寧區志本
許日晏景本相人烏頤師伯幹娘烏詩主貌脩容之
惟作能就詩示謝惠思是晏景本大賞慕
晏景本之詩人
晏景本之文

书影四 明沈氏繁露堂本《诗品》

明
楊平川先生藏善本
述
先甲午年八月
都城
意此舊藏書卷之多如復

宋 蘭鍾喟詩品 足序
秘冊

貴長仲相桓叔諸公猶可數也孫許
善恬淡之詞

王徵士量達王東陽太守殷仲文晉宋之
際殆無詩乎羲熙中以謝益壹歌仲文爲
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今傳亮季友文余嘗忽而不察今
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天倫李驥權參掌事沈暉詩乃
不稱其才亦爲畔舉矣

宋孝武帝不卽王麟宋史于王玄孝武

詩形文辭深過爲精審爲一藩希慕見稱
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
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劉蕡生宋中書令史改修之宋典
禮令舊學者未甚其法雖蘇陵任戴並
著篇章亦爲搢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
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王肅恭惠恭本胡人爲賴師伯
陰陽家詩筆取舍之後造語妙語最

前　　言

钟嵘《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①，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另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名著《文心雕龙》，相继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丰富的文学经验，必然也促进理论批评的发展。代表着这个时期文学上理论思维的最高成就的，就是《文心雕龙》和《诗品》。

《诗品》不同于《文心雕龙》的“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②，它把自己的评论对象只限于诗歌，而且是限于五言诗。但是，它在诗歌理论批评方面作出的贡献，却是重大而卓越的。它初步地建立起我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体系，提出了许多有关诗歌的精辟见解。《四库全书总目》说《诗品》“妙达文理”^③，就是肯定它揭示了文学，首先是诗歌创作的一些重要规律。它对汉魏至齐梁五六百年间的诗歌发展和许多诗人的重要意见，至今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作为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史和诗歌发展史上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唐宋以来，它一直受

①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

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被称为“诗话之源”^①。对于这样一份宝贵的文学理论遗产，我们无疑是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批判继承的。

—

《诗品》的作者钟嵘，生活在六朝的齐梁时代。他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北）人。他确切的生年已不可考。据《梁书》、《南史》本传记载，他在齐永明中为国子生，“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王俭进号卫将军是在永明元年（483），二年（484）领国子祭酒，卒于永明七年（489）^②。又据《南齐书·礼志上》：“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并规定，国子生入学年岁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据此推算，钟嵘如果是在二十岁入国学，他的生年当在宋明帝刘彧泰始二年（466）；如果是在十五岁入国学，他的生年则当在泰始七年（471）。钟嵘的卒年，史书上虽也无明确记载，但根据《梁书》、《南史》的有关材料，却可以推定当是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七年（518）。这是因为《南史》本传有他“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顷之卒官”的记载。萧纲在立太子前封晋安王，他被征为西中郎将只有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七年（518）一年^③。从宋泰始二年（466）到梁天监十七年（518），是五十三岁。从宋泰始七年（471）到梁天监十七年（518），是四十八岁。因此，估计钟嵘终年当在五十岁上下。

颍川长社钟氏从东汉末年就是郡的“著姓”^④。钟嵘的七世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

② 《南齐书·王俭传》。

③ 《梁书·简文帝本纪》：“（萧纲天监）五年封晋安王，……十七年，征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寻复为宣惠将军、丹阳尹，加侍中。”

④ 《后汉书·钟皓传》。

祖钟雅是东晋时“避乱东渡”^①的士族，累官尚书右丞、御史中丞、侍中，死于苏峻之难。事平，追赠光禄勋。钟雅死后，钟氏也随之衰落^②。《南史·钟嵘传》载太中大夫顾嵩回答齐明帝萧鸾时，曾说到钟嵘“位末名卑”的话，即反映了钟嵘当时所处的现实情况。东汉以后逐渐形成的士族制度，虽然发展到东晋以后已经定型，但是并不排除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等原因，士族的内部还可能有升降，这种变化有时甚至还是很大的。看来钟嵘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尽管他出身士族，但到他已不属于士族的上层即所谓“高门”。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使得钟嵘对于当时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门阀士族的反动腐朽性，能有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于士族这种反动腐朽性在文学上的表现和影响，持尖锐的批判态度。《诗品》在文学思想上的进步倾向性，首先表现在这一点上面。

钟嵘的生平事迹，《梁书》、《南史》本传的记载都比较简略。他为国子生以后、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以前的经历，还有以下一些：

- (一) 齐明帝萧鸾建武(494—498)初，为南康王侍郎；
- (二) 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499—501)末，除司徒行参军；
- (三) 梁武帝萧衍天监(502—519)初，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
- (四) 天监三年(504)^③，萧元简袭封衡阳王，出守会稽，引钟嵘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

钟嵘在政治方面的活动，《南史》本传还记述了两件事。一是齐明帝萧鸾躬亲细务，“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莫不争自启闻，取决诏策”。当时为南康王侍郎的钟嵘，曾上书进谏：

① 《晋书·钟雅传》。

② 《晋书·钟雅传》载：钟雅死后，“家贫，诏赐布帛百匹。子诞，位至中军参军，早卒。”

③ 《梁书·衡阳嗣王元简传》。

“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二是梁武帝萧衍天监初，钟嵘为临川王行参军，上书改革政治，揭露和批判了永元乱后政治上的混乱现象：“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从这两件事，可以多少看到一点钟嵘的政治思想倾向。

钟嵘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写作《诗品》。根据《诗品·序》称梁武帝萧衍为“方今皇帝”，可知此书写于梁武帝时。他自述写作缘起：“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①说明他最初是从刘绘受到启示和影响。刘绘历仕宋、齐、梁三朝，卒于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502）。钟嵘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写作《诗品》的。至于全书写定的时间，根据《诗品》体例有所谓“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云云，可以断定当不会早于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二年（513）。因为这一年是沈约的卒年，而他是《诗品》评及的梁代诗人中现知卒年最后的一个。如果钟嵘是从梁天监元年（502）写起，到天监十二年（513），他用在写作《诗品》上的时间前后有十多年，实际上还可能更长些。

关于钟嵘的写作《诗品》，《南史》本传有一个说法：钟嵘尝求誉于沈约，遭到拒绝，为此钟嵘后来在《诗品》中就有意贬抑沈约，将他列在中品：“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对此，后世不少人都表示怀疑。如明胡应麟所说：“休文四声八病，首发千古妙诠，其于近体，允谓作者之圣。而自运乃无一篇，诸作材力有余，风神全乏，视彦升、彦龙，仅能过之。世以钟氏私憾，抑置

^① 《诗品·序》。以下凡引《诗品》，不再注。

中品，非也。”^① 清纪昀也说：“约诗列之中品，未为排抑。”^② 后来古直还举钟嵘的老师王俭在《诗品》中被置于下品一事为例，说：“仲伟于（王）俭有知己之感，而置之下品，足证不以恩怨为高下也。”^③ 这些批驳看来都有道理。《南史》本传的说法，可能只是一种传闻，并无事实根据。

《南史》本传说钟嵘“辞甚典丽”，《四库全书总目》也称他“学通《周易》，词藻兼长”。但是，除《诗品》外，钟嵘没有其他任何作品流传下来。我们只是从《梁书》、《南史》本传，知道他为衡阳王萧元简的宁朔记室时，曾受命写过一篇《瑞室颂》，可是文章也不可见了。

二

《诗品》在《梁书》本传称《诗评》。《隋书·经籍志》：“《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可见当时已有两称。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中也作《诗评》。宋代较多的是用《诗评》，也有用《诗品》的。明代以后，《诗品》这个名称流行。“评”是论优劣；“品”是定品第。《诗品》既然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内容，而钟嵘又说他自己是从刘绘“欲为当世诗品”未成，受到启示才作此书。因此，书的本名究竟是《诗评》或是《诗品》，也就不易断定了。

《诗品》除序言外，正文分上、中、下三卷。序言过去各本多分成三部份，或分置于上、中、下三卷之首，作为三卷的序；或以第一部份为全书的序，二、三部份分别为中、下卷的序。清

①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

③ 古直：《钟记室〈诗品〉笺》。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把三部份合为一篇，作为《诗品》全书的总序，以后就成为通行的格式。序言阐述钟嵘关于诗歌的基本理论观点，并说明《诗品》全书的体例等问题。正文三卷，对汉魏至齐梁一百二十多位诗人逐个进行评论。三卷就是三品。每一品中不再以优劣为先后，而是按时代排列。不过现存各本《诗品》中诗人的先后顺序都有部份错乱，有的也可能是长期流传过程中造成的。

《诗品·序》中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话，说明钟嵘的作《诗品》，有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和刘歆《七略》的影响。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分九品论人，启示了钟嵘的三品论诗；刘歆《七略》论古代学术的流派，启示了钟嵘在《诗品》中对许多诗人创作体貌（风格）进行探源溯流的研究。还有汉末，特别是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以后，社会上形成的品第人物的风气，也广泛地影响到学术文艺领域。齐梁时代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绘画有谢赫的《画品》（《古画品录》）；书法有庾肩吾的《书品》；甚至弈棋也有《棋品》（萧衍、萧纲、沈约都有这方面的著作）。钟嵘《诗品》，正是在这种时代风气和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产生的。

钟嵘把自己研究和品评的对象，只限于汉魏至齐梁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的五言诗，所谓“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这里首先体现了钟嵘关于我国古代诗歌形式发展的一个重要观点。

我国古代诗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时代的《诗经》和《楚辞》，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两个源头。《诗经》是四言诗，但其中已有五言诗的萌芽，出现了半章或全章五言形式的诗篇。《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形式的限制，创造了三四言到七八言的参差不齐的形式。春秋末期出现了成篇的五言歌谣。汉代将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东汉时并开始有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七言诗也是起源于民间歌谣，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文人作的

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

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班固的《咏史》代表文人五言诗的草创阶段，到东汉末五言诗成熟，中间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东汉末一批无名氏“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的成熟。被选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可为代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评论这些作品：“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钟嵘更是赞美它们：“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文学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是文学内容随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学内容的发展变化，文学的形式包括体裁、样式等也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国古代诗歌形式，由四言而五言、七言，又由古体而近体，再发展而为词、曲，都说明这样一个普遍的文学发展规律。总的说来，文学形式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不成熟渐趋成熟的过程。古代诗歌发展到东汉末年，不能不由五言诗取代四言诗，首先即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已非旧有的四言形式所能充分表达，于是文人从民间歌谣采用来五言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比起旧有的四言形式来，在表现能力方面明显地提高了。而这就是五言诗这种形式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并很快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

五言诗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真正奠定基础，是在建安时期。代表作家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曹操这个文学史上开风气的人物，史称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①。他的诗现存二十余首全部是五言或杂言的乐府歌辞。曹丕的五言诗占他写的全部诗歌的一半。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其五言诗的成就也最高。“七子”中以刘桢、王粲二人成就突出，曹

^①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